

“世界公民”与“虚君共和”

——《一个青年的梦》译介过程中的中西之辨

丰 杰

内容提要 鲁迅对《一个青年的梦》的译介过程，可视作五四时期启蒙知识分子对一战后世界政治与文化格局进行思辨的一个缩影。在文学传播过程中，青年之“梦”存在双重内涵。故事文本中的“梦”是以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为主旨的系列梦境。武者小路实笃《与支那未知的友人》与鲁迅、蔡元培、陈独秀等撰写的附文则生成了国民性批判的在地化内涵。世界公民的人类理想与虚君共和的帝国迷梦所形成的巨大反差，诊问着民国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进度与困局。而在近代以来的思想史脉络中，该剧所引发的讨论折射出《新青年》同人在五四时期已然告别文学革命初期的中西二元想象。他们从日、俄、美等国家形象的异变与突进中，求索中国未来走向的理想方案，并因此走向分化。

关键词 鲁迅；《一个青年的梦》；世界公民；虚君共和；中西之辨

五四运动之后，鲁迅翻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四幕话剧《一个青年的梦》在《新青年》上连载，引起《新青年》同人及读者的强烈反响，《新潮》《东方杂志》等刊物紧随其后展开了对日本白桦派和新村运动的推介。这一热潮不仅关联着文学革命的转向，也折射出20世纪初叶中国思想史、政治史的重要拐点。学界对于这部剧作在中国的传播与阐释已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探讨了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一个青年的梦》所表现的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精神与五四运动的内在契合性。董炳月认为：“《一个青年的梦》能够在当时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影响，取决于它对当时中国社会内在需求的满足程度，取决于它与五四时代精神的某种一致性。”^[1]杨位俭、幸鑫认为：“‘一战’的震荡和反应深刻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轨迹，并且使中国思想文化结构中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产生了丰富的张力，为现代中国的民族解放道路赋予了积极的世界主义意义。”^[2]其二是《一个青年的梦》阐释过程中存在的“他国之影”。日本学者小川利康认为周氏兄弟存在“时差”^[3]，并认

为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是实笃之所以受欢迎的一个重要中介^[4]。朱康则认为：“在鲁迅、周作人、武者小路那里都隐藏着一个康德。”^[5]还有一些研究成果借由《一个青年的梦》去解读周氏兄弟在五四时期的重要文本，如《〈呐喊〉自序》^[6]《平民文学》《人的文学》^[7]等等。

无论是从“五四”的内部看向世界，还是从外部的世界反观“五四”，《一个青年的梦》受到关注的程度都足以证明五四时代的中国对世界的变局更加关切，融入世界发展进程的欲求亦更加迫切。而当我们聚焦于这种更趋紧密的思想与政治之关系时，也将产生深一层的疑问。从晚清的民主革命到《新青年》引领的文学革命，民主立场的知识分子用以攻击封建文化的资源是一种笼统的西方想象。如在陈独秀的《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等文章中，“西方”基本可视为现代性国家的象征。而一战之后，所谓“西方”正经历着政治与思想的激变，多元的国家道路与抗衡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中国参战之后，在政治上与其他参战国，尤其是地缘国家，有了更深的汇流与摩擦。这些重要的变化是否

影响了启蒙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感知与评价？如果有，“西方”如何重新定位？“西方”参照系的变化，与五四时期中国形象的建构有何关联？世界形象的更新又将如何作用于中国的文学与文化运动？笔者认为，五四时代的中国，在内部刚刚结束了阶段性的反封建任务，思想启蒙还任重道远。《一个青年的梦》正是在这一时刻被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知识分子关注，充当了他们深入认识正在分化与裂变的西方资源，求索中国未来之路的一个片影与媒介。

一 实笃之梦与“日本”的两极

晚清以来，日本的“东洋”形象是中国学习西方的重要中介。而一战、十月革命等大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思想界亟需重新审视“东洋”形象，进而审度自身在世界的定位。相较于战后流行的反战作品，《一个青年的梦》的独特性在于：其既是日本知识分子从内部反思自身的艺术言说，在译介之后又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反观晚清以来东洋崇拜现象的文学载体。值得注意的是，《一个青年的梦》完成于1916年，到1919年才被鲁迅译介到中国，其间相隔了三年。从译者的阅读经历来看，周氏兄弟对日本白桦派的关注是长期的。1919年推介《一个青年的梦》的行为是一种“重读”。从该剧的主旨精神来看，非战论的思想产生并流行于一战开始之后，并非到1919年才引起跨国性的情感共振。换言之，1919年的时代语境使译介的意愿变得迫切起来。那么，1919年译介该剧的具体历史时机是什么？

一战刚结束时，国内思想界将德国的战败解读为公理战胜强权的最佳证明：“欧战之起因，何自乎？自乎三五国之攘夺不已也。和会联盟会之起因，何自乎？自乎一二二国之主张公理也。以三五国之攘夺，几酿成全欧黑暗之世界。而卒至败衄，偿侵返获，蹙土仅能自免。则强权济一时，公理终古不没之明征也。”^[8]然而，巴黎和会对于山东问题的处理，又使“公理战胜强权”成为了虚伪的口号。1919年5月26日的《每周评论》上头版头条发表了《山东问题》组稿，其中有评论道：“我们

国民因为山东问题，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9]作为一战战胜国的日本，在山东问题上与同是战胜国的中国站在了对立面。这种反转引发了爱国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激烈抗议。这便是翻译《一个青年的梦》的时代语境。

在“五四”的热潮中，翻译外国作家反思战争与强权的作品，并不是偶然行为。鲁迅说：“欧战才了的时候，中国很抱着许多希望，因此现在也发出许多悲观绝望的声音，说‘世界上没有人道’，‘人道这句话是骗人的’。有几位评论家，还引用了他们外国论者自己责备自己的文字，来证明所谓文明人者，比野蛮尤其野蛮。”^[10]《一个青年的梦》的翻译时间与创作时间之差，正包含了“欧战才了”和“巴黎和会”两个大事件。《一个青年的梦》对军国主义的批判，很明显是“外国论者自己责备自己的文字”。武者小路在自序中称：“提起好战的国民，世间的人大抵总立刻想到日本人。但便是日本人，也决不偏好战争；这固然不能说没有例外，然而总爱平和，至少也不能说比别国人更好战。”^[11]《新青年》借这一剧作“日本反思日本”的属性来声援五四运动无疑是十分应景的媒体行为。丸山昇也曾注意到这一时机问题。他说：“对在当时的日本写成的这出反战剧，鲁迅好像也是十分感动的。”^[12]董炳月更为精确地解释了1919年翻译该剧的现实意义：“当实笃作为‘日本人道主义者’从‘日本’的总体形象中凸现出来、当实笃的影响作为‘日本的影响’而存在的时候，‘实笃’具有了‘日本’的意义，日本形象随之发生变化。换言之，‘实笃’赋予‘日本’以新的意义。”^[13]实笃的非战论既汇入了世界流行的人道主义的情感共鸣，也从内部撼动了日本军国主义形象的整体性。

一个青年之“梦”具备双重寓意：第一层是故事空间中的青年梦境，第二层则是青年内心的和平理想。战争的受害者央求青年改变现实社会，但青年无法做出承诺，也给不出解决方案。剧中的先觉者——乞丐——提出了全剧的主旨：

世界的民众成了一气的时候，从根底里握住手，那时战争便许自然消灭了。^[14]

全在根，全在根，全在民众呵。人们再进步些就好了，再一步，再两步。^[15]

武者小路认为，消灭战争的唯一方法是人类进化。人类进化便可以构建“新的这世界的秩序”^[16]。什么是“新的世界秩序”？个体的思想超拔于国家的概念之上，于是能真心相待、友爱互助。概言之，人人都成为世界公民，才能得永久和平。对于这一点，鲁迅是很认可的。他说：“欧战未完时候，在外国报纸上，时时可以看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17]在译者序中，他直接表示赞赏：“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18]武者小路的这种言论无疑也契合了一战后的世界主义思潮。

更深一层的文化语境在于，“实笃之梦”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自省，表征着甲午战争以来作为效仿对象的“东洋”形象在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心中的瓦解。晚清时期，无论是倡导立宪制的维新派，还是主张共和制的革命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思想文化的影响。徐志民认为：“1896年中国首批13名学生赴日留学，不仅标志着千年以来中日‘师生关系’易位，而且近代中国持续不断的留日运动，对中日两国社会和中日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19]辛亥之后的军政府里，留东知识分子也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郭沫若曾回忆说：“这第二批的新政府东洋帮最占势力，特别是东文帮，所有各部的部长副部长差不多是被他们包办的。”^[20]明治维新后强大起来的“日本”形象，其核心的内涵便是军国主义。晚清留日学生中普遍流行的尚武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日本军国主义文化的影响。东京时期的鲁迅亦写就过尚力的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以及改译小说《斯巴达之魂》。进入大正时期后的日本，在一战中又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然而，这时日本的飞腾却不再能够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仰慕。相反，一战与山东问题使中国知识分子更多地看到了军国主义的恶果。也就是说，从明治时期到大正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日本”形象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此外，纵使《一个青年的梦》的题旨是非战论，但故事文本里依然存在军国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顽强抗辩。一方面，主人公A从情感上无限认同战争所带来的恐怖与创伤，对战争受害者充满悲悯与愧疚；另一方面，叙事者从理性上又无法提出消除战争的有效方法，并通过情节编排演绎了战争的必然性。该剧第三幕第三场是一个“梦中梦”：青年目睹了上级生和下级生之间的矛盾演进过程，随后卷入其中，直至在下级生群攻之下开枪“杀人”。叙事者通过这一“圈套”成功引诱青年成为一个新的施暴者。青年遁入圈套的事件，论证了人自身既具备反战的意愿，同时也携带着助战的基因。第四幕又以“剧中剧”的形式，抽象地演绎了一战发生的内在逻辑。“恶魔”给“德大”等国家统治者不断灌输强权思想，于是“德大”等国强制征兵，扩大战争规模，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一个关键的细节发生在“英大”身上：“德大”强制征兵的行为一开始为“英大”所不耻。“英大”也数次拒绝了“恶魔”的建议。在征兵的问题上，“英大”与“德大”构成了人道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对垒。这也赋予了“英大”正义的参战之名。但随着国家间的交恶越来越深，“英大”最终放弃了一开始的立场。“英大”的变化演绎了公理与强权的抗衡及其结局，极为微妙地与巴黎和会和当时崩溃的“威尔逊主义”构成某种程度的隐喻关系。20世纪30年代武者小路在立场上的变化，或可看作《一个青年的梦》中军国主义自觉抗辩的一种回响。

二 “虚君共和”与国民性困局

尽管《一个青年的梦》所具有的“批判”性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其在中国的接受基础，但作为译者的鲁迅，以及陈独秀、蔡元培等《新青年》同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将读者引入了内省的阐释路径。《新青年》编辑将《与支那未知的友人》刊登在第七卷第三号上，置于《一个青年的梦》第三幕之前，并附上了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的附记。这些附文为《一个青年的梦》重新打造了一个国民性批判的小语境。

那么，《一个青年的梦》第三幕与前两幕相比

有什么变化？前两幕中，青年A是战争受害者的听众，听与被听的人物关系相对稳定。第三幕的第一个部分里，青年A仍是听众，但“被听者”出现了“受害者”与“幸免者”的二元结构。画家是受害者，因战争而失去了儿子。村长是“幸免者”，在画家的儿子参战时还对其表达过赞誉。后来，当村长自己的儿子也参战了，他才意识到之前的赞赏其实是种残忍。村长形象与鲁迅同时期所批判的“暴君的臣民”很类似：

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满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个例：小事件则如Gogol的剧本《按察使》，众人都禁止他，俄皇却准开演；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21]

《暴君的臣民》的写作时间与《一个青年的梦》的翻译时间是重叠的。鲁迅将世界范围内的帝制暴政统合起来进行思索，所得出的结论是臣民之暴甚于暴君。擅于“幸免”的臣民，正是暴政得以绵延的基石。武者小路塑造的村长形象，可谓间接体现了鲁迅关于国民性的观点。

后来《一个青年的梦》在中国出单行本，《与支那未知的友人》作为作者序，重新奠定了整剧的基调。至此，“国民性批判”的主题，几乎完全取代了剧本前两幕的“军国主义批判”主题。无论武者小路的信是否直接受到鲁迅的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鲁迅在翻译该剧之前，就已经意在借“他国之镜”来反观中国当时的启蒙困境了。如高强所说：“有关‘国民’的话题却是他持续思考的重心，主张大胆吸取外国思想资源，时刻警惕传统与本土言论的思想危害，则是鲁迅始终抱持的思想态度。”^[22]在鲁迅看来，《一个青年的梦》“很可以医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23]他试图将读者引向内部的自省：

我虑到几位读者，或以为日本是好战的国度，那国民才该熟读这书，中国又何须有此呢？我的私见，却很不然：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的自己。譬如现在

论及日本并合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教人害怕了。^[24]

推及一战，鲁迅所忧虑的是“如果中国有战前的德意志一半强，不知国民性是怎么一种颜色”^[25]。从建设世界公民，走向永久和平的这一理想来看，鲁迅与武者小路无疑存在共鸣，但鲁迅对《一个青年的梦》的阐释，最终还是为了解决中国本土的现实问题。

进一步的疑问在于，国民性问题在晚清就已经被提出来，在文学革命时期更是文学创作的核心内容，为何《一个青年的梦》及《与支那未知的友人》这样的译文还能在这一问题上引发热烈的讨论呢？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在一战时期形成了更为紧密的（无论是冲突还是融合）国际关系，民国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进度与问题才更为鲜明的暴露出来。蔡元培、陈独秀对武者小路“日本也还没有完全觉醒，比支那却已几分觉醒过来了”这一判断均表示了认可。^[26]这种平行的比较，显然加剧了他们对于国民性问题的焦虑。在这一时期，鲁迅谈及国民性，也都比较明显地将其放置在世界视野中进行定位与诊问。如《“圣武”》一文：

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实没有插足的余地。

因此，只须防那“来了”便够了。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27]

鲁迅在这里将中国的辛亥革命与俄国的十月革命进行了对比。同是反封建革命，两者的结果却相距甚远。别国“有主义的人民”牺牲生命换取的是“新世纪的曙光”，而在当时的民国，由上而下所沉溺的仍然是一种“取秦始皇而代之”的帝王之梦。

一方面，武昌起义后不久，原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撰写《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提出保留君位，推行虚君共和制。这种构想正中袁世凯下怀。桑兵认为：“袁世凯借用虚君共和名义，旨

在与南方讨价还价，实际上不过以退位换优待的名义，与康有为保留君位的本意大相径庭。”^[28]民国固然没有直接走上虚君共和之路，但保留君位的理想却滋长于北洋派的灵魂深处。另一方面，革命后溥仪的命运与俄皇尼古拉斯二世迥然不同。中华民国与清室签订了无规定限期的优待条件，使溥仪能够继续留在紫禁城当宣统皇帝。“这无论在象征意义上，还是在实际的社会存在上，都为逊清遗民提供了生存空间与精神依凭。”^[29]在庄士敦看来：“在中国，玉玺比在其他国家更为重要。实际上，在1912年初起草‘优待条件’时，‘民国’的创建者们就对仍由皇帝监管玉玺一事表示过严重的疑虑，并由此联想到了皇帝退位的现实性和永久性问题。”^[30]这种疑虑指向的是帝制的复活。竹内好的分析更为精准：“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异民族统治的绝对制度，但支撑这个绝对制度的官僚机构没有崩溃。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还削弱了不与之妥协、未能推进的革命势力。窥视着这一微小缝隙的，有和外来帝国主义勾结的军阀意欲夺回帝制的阴谋等等，一个反动的黑暗时代在继续着。”^[31]可以说，辛亥之后，袁世凯和溥仪分统着现实的政治和精神的政治。作为其羽翼的北洋系与宗社党“植根于相同的社会土壤和由千百年的历史积淀而成的皇权心态”^[32]，严重阻碍着民主共和的发展。

梁启超在袁世凯谋求改共和制为君主制时，曾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进行抗议。他在文中将国体分为君主制与共和制，强调两者的对立不可调和。而康有为执着于调和两种对立的国体，自然还是为保留君位作理论声援。康有为的发声看似荒谬，但却是北洋统治时期政治文化复杂性的一个缩影。北洋各派系虽斗争不断，但对于保留小朝廷里的溥仪，却几乎没有异议。1917年，康有为在长文《共和平议》中，以欧美国家为参照系，再次鼓吹他的“虚君共和”构想，以支持张勋拥戴溥仪复辟。陈独秀在驳斥康有为的文中，亦援引了世界各国的政体与国体，分陈利弊，从而揭示出所谓虚君共和，实是专制而非虚君^[33]。日本与俄国等边缘国家在一战后于经济上或政治上有了里程碑式的跃进，而徐世昌时期的民国仍不乏《老徐又想改虚君共和政体》这样的新闻^[34]，和政府官员跪倒在

溥仪面前大呼“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35]这样的场景。无怪乎陈大齐愤而总结道：“从民国建设到如今，足足的过了七年有零，虽然是积重难返，依旧做皇帝”^[36]。正是因为“帝国之梦”未醒，国民还未塑成，所以《新青年》同人仍然困于与帝制文化的鏖战。陈独秀撰写的《偶像破坏论》，鲁迅创作的《风波》等，都旨在揭示帝制文化的贻害。《一个青年的梦》被《新青年》同人进行文化过滤，作为“他山之石”纳入国民性批判的启蒙思潮之中，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三 “西方之影”与多元前途的开显

“世界公民”的人类理想与“虚君共和”的帝国迷梦，同在“五四”前后的中国构成了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关系，揭示出民国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落后位置。突破这一困局，就势必要在走向分化的“西方形象”中，重新寻求适合于自身未来发展的道路。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已不再将日本作为学习对象。而威尔逊主义未能在巴黎和会上兑现，其光环也随之消弭。基于此，围绕青年之“梦”展开的思辨中，便包含着对于“西方之影”的深层离析。小川利康、朱康分别认为《一个青年的梦》与周氏兄弟的共鸣之中，存在着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国文学之影和康德代表的德国哲学之影。笔者认同这种说法，并进一步认为有关《一个青年的梦》的讨论与思考，至少涵盖三条道路。它们分别是武者小路的新村运动、康德的思想启蒙、俄国的十月革命。

武者小路的新村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作为新村运动在中国的积极追随者，周作人以八道湾十一号为址作新村的实验^[37]，并接连作思想上的宣传与讲演，发表了《日本的新村》《新村的精神》《访日本新村记》等系列文章。相较于社会的反响，鲁迅并未表现出热情。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说：“关于《新村》的事，两面都登也无聊，我想《新青年》上不登也罢，因为只是一点记事，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的。”^[38]如顾钧所说：“鲁迅对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当然也很有趣，但一般来说他觉得这些只能用于思想启蒙，而无从见诸实施。”^[39]新村运动本质上是知识阶层摆

脱社会运转机制的社群乌托邦。这种构想类似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并不陌生。

康德哲学在一战后的流行，正如武者小路在五四时期中国的流行一样，都从内部塑造了国家形象的多义性。“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大战役开始后，英法美诸国学者，无不异口同声，攻击日耳曼主义德国哲学，惟对于康德则未闻有非难之声。所以然者，盖因康德不但主张自由平等说，且为永久和平说之首倡者也。”^[40]“永久和平论”既抚慰了战时人们的心灵创伤，也具有“外国论者自己责备自己”的道德意味。而康德在中国的流行，还有中国的主体性原因。在康德看来，走向永久和平的根本途径是启蒙。这与文学革命以来进步知识分子倡导的思想革命相契合。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类从自我造成的未成熟状态中走出，未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4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启蒙”一词，意在对他进行启蒙。康德启蒙论的逻辑起点则是自我启蒙。杨云飞认为：“作为启蒙思想的典型，康德批判哲学的实质，正是一种世界公民哲学。”^[42]可以说，武者小路与康德相似的是世界主义的终极理想，而鲁迅与康德相似的是思想启蒙的文化路径。然而，无论是武者小路的非战论，还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都强调一种超越世俗利益关系的个人道德自律，难以突破知识分子的圈层普及到民众中去。加之绝对的人道主义又极可能直接滑入“不抵抗主义”的窠臼，反过来被强权利用。因此，这两种道路客观上都无法解决20世纪初叶世界与中国历史语境中的现实政治问题。

在武者小路非战论被热议的时候，托尔斯泰于1906年给张庆桐的复信也被重新提及。在信中，托尔斯泰以当时刚结束的日俄战争为背景对中国提出建议，展现了鲜明的反侵略立场。他认为中国人的高尚美德在于“宁愿忍受加于他的一切暴力，而能坚持到底的忍耐的精神”，并劝说中国要重视“大多数的农业人口”，“不要走日本的道路”^[43]。陈独秀将托尔斯泰的信与武者小路的信相类比，为托尔斯泰当年的劝告未受重视而感到遗憾。这与当时落后的沙俄形象不无关系。晚清至文学革命

期间，受到知识分子推崇的是西洋、东洋的价值观，处于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是“欧洲最野蛮，喜侵略的国”^[44]。而十月革命让俄国形象得到重大扭转。托尔斯泰也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在武者小路看来，“第一落后的俄国，现在将第一的在前了”^[45]。蔡元培也称：“俄国人的尽力，是我们的模范。”^[46]《新青年》场域中，《圣处女的花园》《摩诃末的家族》等大量俄国反战文学发表。陈独秀此时重提托尔斯泰写给张庆桐的信，并将信中的观点进行重新排序，调整为“劝中国人不要抛弃农业，不要羡慕西洋富强，不要迷信立宪政治，不要取武力抵抗主义”^[47]。调序之后，托尔斯泰“不抵抗主义”的观点被淡化，重视底层民众的观点被强化。这一“新”的托尔斯泰形象显然更接近于列宁的阐释。而关键的细节还在于，托尔斯泰对中国占大多数的农民群体表现出的极大重视与认可，与武者小路对中国国民的判断有很大不同，恰可为陈独秀的观点作支撑。陈独秀认为：“中国人除了少数的欧美日本留学生在那里做‘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梦，最大多数的老百姓，自来没有中这种毒；武者先生不曾到过中国，或者还不晓得他们可爱的性质。”^[48]《一个青年的梦》连载完之后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六期，就是“劳动节纪念号”。陈独秀于其中发表了一篇《劳动者底觉悟》，开篇说道：“世界上是些甚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49]同样是反对帝制文化，文学革命初期的陈独秀认为帝制文化与国民性问题具有同源性，而五四之后，陈独秀将帝制文化与国民性问题剖离开来，作为两个独立的问题看待。由此可见，此时的陈独秀已经脱离了文学革命初期的西洋崇拜思想，其政治立场也已从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典范，侧面增强了陈独秀等知识分子的民族自信心，改变了他们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判断。

从“西方之影”的分化，可以看到《新青年》同人的分化。那么，鲁迅的态度如何？我们通常认为，五四时期的鲁迅坚守着启蒙立场，直到“四·一二”政变后去到上海才有左转的趋向。而

通过《一个青年的梦》的译介过程可以看到，五四时期的鲁迅在多元的国家前途中，已然表现出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认同与敬意。他的思想立场开始从康德式的内省与自律，转向外部的斗争与牺牲。鲁迅在译者序中说，自己与《一个青年的梦》有“意见不同的地方”^[50]。“不同”大致在于鲁迅不认可“绝对的非战论”。从外部因素来看，鲁迅这种思想的形成与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一系列外交动作有关。1919年7月25日，苏俄发表《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在中利益，俄国由此告别了沙皇时期所形成的侵略者形象。鲁迅虽然未在文章中直接评论这一事件，但同月所撰的随感基本都以苏俄在人道主义上的进步作为背景。当月31日，鲁迅在日记中载“寄钱玄同信并文稿八枚”^[51]。这天寄的稿件是随感录的六十一至六十六，分别是《不满》《恨恨而死》《“与幼者”》《有无相通》《暴君的臣民》《生命的路》。鲁迅的核心观点是：“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捐助的。”^[52]此时的鲁迅主张积极进取的人道，而非消极隐忍的人道。所以，他不可能热衷于逃避现实政治的新村运动。

从内部因素来看，鲁迅对于十月革命的敬意，还与他素有的进化论思想有关。他认为：“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53]正因为人类的生命在进化，所以“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54]。死亡成为了一种“大欢喜”，是勇者与爱者才有的人生境界。1919年10月，鲁迅还专门撰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与上述几篇随感一起刊登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在这一“进化”的人道观上，鲁迅与日本白桦派的有岛武郎很有共鸣。丸山昇在论及鲁迅1920年代翻译的《壁下译丛》时提出：“有岛的主张是建立在对‘自己’的局限性的认识之上，以对其他可能性的绝望为媒介产生出来的。而鲁迅在这一点上，明显地接近于有岛。”^[55]概而言之，无论是对武者小路、有岛武郎代表的日本知识分子，还是鲁迅、陈独秀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国家形象的苏俄之

诞生，都改变了他们原本单线性的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理解。而重新含括了俄国在内的“西方形象”，又构建了更为完整的“世界形象”。与此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革命遭遇了循环往复的困局与挫败之后，终于在重新点亮的多元世界中，找到了积极介入现实的途径与方法。

四 “调和论”批判 与追赶世界的可能性

在新的世界格局下对中西文化的思辨，最终落脚于中国如何追赶世界的问题。钱玄同认为：“从现在以后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现在以后的中国人，是世界上人类的一部分。所以无论讲时事，讲古事，都和世界各国相关连。”^[56]中国与世界如何关联？在进步知识分子看来，当时的民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惯用“调和论”去解决“中与西”“新与旧”的问题。

何谓“调和”？朱希祖认为：“折中二字，是新旧杂糅的代名词，就是把旧材料用新法制组织的代名词，或是旧材料新材料并用的代名词；这是我们中国社会上最流行的思想和主义。”^[57]主张调和的人，大抵称调和有两大作用。一是接轨世界，二是实现和平。1919年，国内军阀与官僚“效仿”巴黎和会，开始筹备国内的和平会议。这成为进步知识分子展开“调和论”批判的一大诱因。同年发表的批判文章有高一涵的《和平会议的根本错误》，鲁迅的《随感录五十四》，朱希祖的《非“折中派的文学”》，蒋梦麟的《新旧与调和》，陈独秀的《调和论与旧道德》等诸篇。这些文章很明显地摆脱了文学革命初期的中西二元思维。高一涵从政治角度批判南北和平会议对巴黎和会的“效仿”：“人家以秘密主义，为扰乱世界和平的祸根，不惜尽力打破之；我国反以秘密主义为天经地义，而极力实行。”^[58]蒋梦麟则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矫正以往的“西洋”崇拜：“新思想不能用时代来定，也不能以西洋输入的来做标准。”^[59]

“调和论”看似包纳了西方话语，紧随着世界潮流，但实际上是用两套时空系统套叠在一起。鲁迅在《随感录五十四》中引用了黄郛《欧战之教训与

中国之将来》中的一段话：“他若贺阳历新年者，复贺阴历新年；奉民国正朔者，仍存宣统年号。一察社会各方面，盖无往而非二重制。”^[60]民初之后，至少存在公历纪年、民国纪年、宣统纪年三种纪年方式。这也表征着国民的二重甚至是三重思维。康有为的“虚君共和”正是二重思维的典型。基于时空的“二重制”，康有为所代表的遗老遗少得以活在“另一个民国”之中。鲁迅断言调和的终局是破产：

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这许多事物挤在一处，正如我辈约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即使竭力调和，也只能煮个半熟；伙计们既不会同心，生意也自然不能兴旺，——店铺总要倒闭。^[61]吃人思想与人道主义，君主制与共和制，宣统与民国，都是绝对的对立关系。对立的二元不可能真正并置与融合，所以只能形成一表一里的结构。“调和”的倡导者无外乎是封建制度或封建思想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大势所趋的世界潮流中，以妥协迎合的姿态企图化解自身的权力危机，本质则是要以旧文化浸染新文化，让新文化溶解于旧文化之中。

如果将《随感录五十四》与《阿Q正传》当作互文来看，可以发现《阿Q正传》的荒诞感正源于“二重时空”的套叠效果。在文学革命时期，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主要基于一种“古今”比较的时间思维。狂人的“罪过”是踹了一脚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狂人的大发见是“仁义道德”的历史吃人；狂人拷问的是“从来如此，便对么？”五四之后创作的《阿Q正传》，则不仅存在“古”与“今”的对立，还存在着“中”与“西”的反讽结构。小说中典型的“洋化”人物是钱洋鬼子和黎元洪。虚构的钱洋鬼子形象所占篇幅很大，其亮相为：

远远的走来了一个人，他的对头又到了。这也是阿Q最厌恶的一个人，就是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

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他的母亲大哭了几十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后来，他的母亲到处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的。本来可以做大官，现在只好等留长再说了。”然而阿Q不肯信，偏称他“假洋鬼子”，也叫作“里通外国的人”，一见他，一定在肚子里暗暗的咒骂。^[62]

钱洋鬼子的核心特征是有留洋经历。叙事者对他的直接描写是：“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这自然是趋于进步、现代的生理与审美变化，与当时的“东洋”时空是相符的。内涵更为丰富的则是侧面描写，即透过未庄人的眼睛来“看”钱洋鬼子。一方面，钱洋鬼子因为“洋化”而占据了未庄革命的主导权。赵秀才、阿Q想参加革命，都需征得他的同意。与钱洋鬼子打交道时，赵秀才和阿Q也都伪装成“洋”的样子，表达出对“洋”的尊重。如赵秀才“将辫子盘在顶上”，阿Q称钱洋鬼子为“洋先生”。钱洋鬼子看似成为了未庄与世界的桥梁。另一方面，钱洋鬼子的母亲和老婆、阿Q又都以“洋化”为耻与罪。母亲和老婆因钱洋鬼子的“洋化”而大哭与跳井。阿Q更认为钱洋鬼子之“洋化”非徒有其表，而是已渗入灵魂。灵魂的“洋化”，就意味着“里通外国”，是死罪。可见“东洋”时空仅仅浮于“未庄”时空的表面，不构成思想与精神的真正交流。

鲁迅在小说中极少使用革命党的真名。《药》以秋瑾为原型，但化其名为夏瑜。《狂人日记》中，狂人在追溯吃人历史的时候，曾援引了徐锡麟被吃的例子。徐锡麟写作“徐锡林”。在清末的文化语境中，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家往往会避免在小说中使用革命党人的真名。鲁迅在民国之后沿用这一习惯，则意在建构一种仍然很“古”的时空氛围。《阿Q正传》中提到的实有其人的辛亥人物是黎元洪，名字未改。这一细节值得辨析。在真实历史和革命派作家的辛亥题材作品中，黎元洪并不是一个正面的革命党人形象；在林纾、陆士谔等崇尚帝制或持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家笔下，革命被解读为“反清复明”或“排满兴汉”，于是黎元洪被塑造为开国英雄形象。而无论在革命派还是守旧派的理解之中，黎元洪都是偏于传统的人物。然而钱洋

鬼子意中的黎元洪，却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形象。这位“洪哥”（本土会党的叫法），张口就说“NO”（洋化的语言）。“NO”作为西洋舶来的词汇，拥有“洋化”的语言外壳，其语义内核却是拒绝他人参与革命（黎元洪不准钱洋鬼子革命；钱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而“排他性”恰恰是等级制而非民主制的特征。接下来，未庄的革命仍是“调和”：“钱洋鬼子”联合“赵秀才”去革命，砸掉尼姑庵“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却顺走“宣德炉”。这些“革命者”行迹无疑从内部解构了由“洋化”包装出来的“现代性”。故而“调和”不是进步，“将来仍然免不了落后”^[63]。这是对《随感录五十四》的题旨——“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究寻不出位置的”^[64]——的戏剧化演绎。鲁迅在译介《一个青年的梦》的过程中所加深的渗入了世界感与空间感的思想心得，经过与社会现实的碰撞和艺术思维的沉淀，又从他的创作文本中抽象（随感）和具象（小说）的呈现出来。至此，文学实现了内在的流转，产生了超越国界的艺术共振。

结 语

竹内好曾评价鲁迅：“对人类进步毫无动摇的信念是他的根柢。他的文学，显示了后进国具有的可能的极限类型，但就是那种原初状态联系着世界文学之场。”^[65]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这里，世界主义实际上是对民族主义的否定之否定。在从民族走向世界的潮流中，鲁迅所表达的世界主义精神，是以自强进取的民族主义为底色的。这恰是其与“不抵抗”的消极世界主义的根本区别。鲁迅的这种思想在五四时期也并非一种异质性的存在。一方面，在“西方形象”瓦解与“世界形象”建构的过程中，“中”与“西”的关系不再是单向的模仿。“中国”处于“世界”之中，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了一种新的共识。钱玄同曾撰写《恭贺新禧附记》《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等系列文章，大力倡导公历纪年，便意在打破人造的“时空”屏障。另一方面，苏俄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突破了倚靠地理、种

族、国家而产生的人类关系，阶层成为了连接世界的新概念。以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北京大学学生引领世界语运动，即是为“全球人类组成一大同盟”^[66]“排除言语上的障碍”^[67]。总而言之，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走出了清末民初的狭隘种族主义，形成了具有现代性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而随着民族意识与世界意识的更新，民族性与世界性、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体构成了互相依存、共存共荣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一思想认知的重要拓进，开始真正构筑起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结，同时也标志着五四精神所具有的原点性意义。

[1][13] 董炳月：《梦与梦之间——中国新文学作家与武者小路实笃的相遇》，《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2期。

[2] 杨位俭、幸鑫：《“一战”如何重构了新文化——以〈新青年〉相关刊文为中心的考察》，《中文论坛》2019年第1辑。

[3] 小川利康：《周氏兄弟的“时差”——白桦派与厨川白村的影响》，《文学评论丛刊》2012年第2期。

[4][7] 小川利康：《日本新村对周作人之影响再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4期。

[5] 朱康：《鲁迅·康德·威尔逊——走向永久和平》，《上海书评》公号2018年11月12日。

[6] 赵歌东：《从鲁迅译〈一个青年的梦〉看〈呐喊·自序〉》，《东岳论丛》2006年第1期。

[8] 晦厂：《公理》，《广益杂志》1919年第9期。

[9] 双眼：《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每周评论》1919年5月26日。

[10][52] 《随感录六十一·不满》，《鲁迅全集》第1卷，第375页，第3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1][16] 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自序》，《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12][55] 丸山升：《鲁迅和〈宣言一篇〉——与〈壁下译丛〉中武者小路、有岛的关系》，《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王俊文译，第6页，第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15] 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鲁迅译，《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17][18][25][50][63] 鲁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 [19] 徐志民:《日本的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1期。
- [20] 郭沫若:《反正前后》,第200页,上海现代书局1929年版。
- [21]《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鲁迅全集》第1卷,第384页。
- [22] 高强:《国民文学论争:分裂的“后五四”与文艺改塑的先兆》,《中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
- [23][24] 鲁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 [26][46][47][48] 周作人、蔡元培、陈独秀:《〈与支那未知的友人〉译者附记》,《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年2月1日。
- [27] 鲁迅:《随感录五十九·“圣武”》,《鲁迅全集》第1卷,第373页。
- [28] 桑兵:《辛亥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 [29] 冯天瑜:《民初“文化遗民”研究》(罗惠缙著)“序言”,第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 [30]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陈时伟等译,第85页,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
- [31][65] 竹内好:《从“绝望”开始》,靳丛林编译,第197—198页,第209—21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 [32]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36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 [33] 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平议》,《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
- [34]《京报纪复辟派之活动》,《民国日报》1920年6月23日。
- [35]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37页,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 [36] 陈大齐:《“恭贺新禧”》,《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 [37]《新村北京支部启事》,《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
- [38] 鲁迅:《190813致钱玄同》,《鲁迅全集》第11卷,第379页。
- [39] 顾钧:《周氏兄弟与〈一个青年的梦〉》,《上海鲁迅研究》2005年冬卷。
- [40] 佚名:《评康德之永久平和论》,《东方杂志》第15卷第9号,1918年9月15日。
- [41] 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康德论教育》,李其龙、彭正梅译,第7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 [42] 杨云飞:《理性的公共运用与世界公民的哲学——对康德启蒙观的一种探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 [43] 列夫·托尔斯泰:《致张庆桐》,《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6卷,周圣、单继达等译,第325—3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 [44] 周作人:《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 [45] 武者小路实笃:《与支那未知的友人》,周作人译,《新青年》第7卷第3号,1920年2月1日。
- [49] 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
- [51] 鲁迅:《己未日记[一九一九年]七月》,《鲁迅全集》第15卷,第375页。
- [53] 鲁迅:《随感录四十九》,《鲁迅全集》第1卷,第355页。
- [54] 鲁迅:《随感录六十六·生命的路》,《鲁迅全集》第1卷,第386页。
- [56] 钱玄同:《论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
- [57] 朱希祖:《非“折中派的文学”》,《新青年》第6卷第4号,1919年4月15日。
- [58] 高一涵:《和平会议的根本错误》,《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 [59] 梦麟:《新旧与调和》,《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5期,1919年11月1日。
- [60][61][64] 鲁迅:《随感录五十四》,《鲁迅全集》第1卷,第361页,第360页,第361页。
- [62] 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521—522页。
- [66] 列悲:《介绍环球世界语会》,《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3月7日。
- [67] 列悲:《世界语与工党》,《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5月1日。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任编辑:何吉贤